

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

王川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27—1943年期间,从水木清华到西南天地,刘文典、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辍,严谨治学不改,民族气节不丧,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与惺惺相惜,有着牢固的基础。二人在学坛上留下的论道学艺的佳话,更是士林的一段美谈。

关键词:刘文典;陈寅恪;交往;中国近现代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1-0108-11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晚年人滇自号“二云居士”,安徽合肥人,近现代著名学者。青年时期,曾从陈独秀、刘师培学习。1909、1913年,两次赴日留学,并从章太炎治《说文》。1916年,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期间,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翻译、介绍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的学说。1927年,任安徽大学首任校长,因不同意处罚学生运动领袖而被蒋介石政府投入监狱,经蔡元培等人努力获释。1928年,重新执教北大。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1931年,代理系主任。1937年,随校内迁,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任云南磨黑中学校长,脱离联大,联大由此解聘刘文典。从1944年起,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去世。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有鉴于此,笔者撰写了此文。

一 清华八年(1927—1937):对对子风波

1928年之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聘刘文典来北平执教,时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应允,以安徽大学坚留而未能到清华大学[1]。不久后,刘文典北上再次执教北大。

1929年初,刘文典终于遂愿执教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简称中文系)。而此时,陈寅恪早已是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了。对于刘、陈的这一新旧状况,4月,罗家伦在答上海记者问时云:

(在余任内)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系新添之教授,为……有专门学术者也,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待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2]

罗氏之言,指出了当时刘、陈二氏之所长。

到清华后,刘文典即投入教学与研究。同年12月17日,他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3](82页)。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不久,清华中国文学会决定出版《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刘文典、陈寅恪的论文得以在该刊物上发表[4](91—93页)[5](6—7页)。

收稿日期:2002-09-18

作者简介:王川(1969—),男,四川省乐山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后。

1930年5月,罗家伦请辞校长之职,次年3月获准。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乃任命心腹吴南轩继任。吴南轩官僚作风严重,“未及二月,一切设施,均背同学公意,且妄改校章,不维信用,蔑视教授,贪夺权利,致激起全体同学之公愤,引起教授之反抗,忍无可忍之余,驱吴运动爆发”[6]。刘文典参与了运动,一向很少抛头露面的陈寅恪亦忍无可忍,在会上当众痛斥吴南轩办事糊涂,要求吴立刻辞职。刘文典、陈寅恪还与其他同仁一道签名要求更换校长,声明“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7](103页)。同年7月,吴南轩下台。

1931年秋,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并上《庄子》、《墨子》、杜诗等,认为“诸书或以记事为职,或以立意为宗旨,或以文辞为主,要皆吾国语文学之根本”;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并上“文学专家研究”课程,如阮籍、陶潜、庾信、李商隐、苏轼等,“取专家中之足以表一时代文学或能独创一格者,加以研究与批评”[8](299—307页)。此外,在历史学部,陈寅恪开设“中国中古史专题研究”课程,指导学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执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二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见表一)。

表一 刘文典与陈寅恪共同指导的研究生

时间	研究生姓名	考试类型	论文题目	资料出处	附注
1933年3月17日	萧涤非	毕业初试	——	《朱自清年谱》,第120页	
1933年6月12日	萧涤非	论文考试	《乐府之变迁史》	《朱自清年谱》,第123—124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卷上册,第648页	黄节为主席
1934年5月23日	霍世休	毕业初试	——	《朱自清年谱》,第134页	
1935年2月28日	霍世休	论文考试	《唐代传奇中的印度故事》	《朱自清年谱》,第142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卷上册,第657—658页	陈寅恪为主席
1935年5月30日	崔殿魁	毕业初试	——	《朱自清年谱》,第146页	
1935年6月20日	崔殿魁	论文考试	《萧选李注杨榘》	《朱自清年谱》,第147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卷上册,第657—658页。	
1936年7月30日	何恪恩	毕业初试	——	《朱自清年谱》,第160页	
1936年9月17日	何恪恩	论文考试	《〈曲江集〉考证》	《朱自清年谱》,第162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卷上册,第688—689页。	
1936年10月2日	张恒寿	毕业初试	——	《朱自清年谱》,第162—163页	
1936年10月15日	许世瑛	毕业初试	——	《朱自清年谱》,第163页	

此外,刘文典、陈寅恪还同为《清华学报》这一学术刊物的编委。按:7卷1期(1932年1月)出版之前,《清华学报》系由“国立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从7卷2期(1932年6月)起,改设学报编辑部,以浦薛风为总编辑,编委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共事、论文于水木清华,刘文典、陈寅恪由相识到相知,相互了解逐渐加深,学术情谊日笃。清华时期,刘文典、陈寅恪学术交往最著名的事例是所谓“对对子”风波。

1931年8月,按清华休假制度,中文系代理系主任朱自清赴英访学一年。其代理系主任之职,暂由刘文典代理[3](90页、97页)。1932年夏,陈寅恪准备前往北戴河休养。一日,刘文典来访,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因已决定次日出发,故陈寅恪“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

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对对子这类试题又见于陈寅恪拟定的二、三年级转学生试题:“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以及研究生入学试题:“墨西哥”、“人比黄花瘦”[9](221—228页)。

陈寅恪选定对对子为考试方式的理由,与他“尤以做对子为长”又有密切关系[10]。在此,按编年顺序,笔者排出陈寅恪史学的“对子”系列(见表二)。

表二 陈寅恪史学的“对子”系列

清华执教初期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哲三《陈寅恪轶事》
1927年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集》,第17页
1928年	黻珮想雍容,遗范开元全盛世。莫斋薪净乐,伤神长庆悼亡诗。	《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8—29页
1930年	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63页
40年代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同上
1941年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殫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无庖,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陈寅恪诗集》,第29页
50年代中	野老已歌丰岁语,暗香先返玉梅魂。(集苏轼诗句)	金应熙《陈寅恪传》,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352页。
1956年	中秋共赏团圆月,大学新栽桃李花。	吴定宇《陈寅恪传》,第205页
1957年	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陈寅恪诗集》,第107页
1957年	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同上书,第106—107页
1957年	古董先生谁似我,新花齐放此逢君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197页。
1958年	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	《陈寅恪诗集》,第113页
1959年	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	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第10页
50年代	得过且过日子,半通不通秀才。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86页。
1961年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鞏陈瞽马牛风 ^②	同上书,第317页。
1964年元旦	丰收南亩春前雨,先放东风岭外梅。	吴定宇《陈寅恪传》,第228页
1967年	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枯眼人。	《陈寅恪诗集》,第150页

清华学生所对之对子,亦令人叫绝。对于“孙行者”,陈寅恪自定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9](221—228页)[10](53页),中文系学生周祖谟、张政烺等三人均答“胡适之”[11][12][13][14](156页),又有学生答“祖冲之”^③。对于“墨西哥”,中文系学生赵萝蕤等人均未答出^④。对于“人比黄花瘦”,有学生答“情如碧海

深”[15],诚妙对。

“对对子”试题在社会上传开后,招来沸沸扬扬的议论。尤其是洋派人士,认为对子与八股文是旧时代的产物,是落后、保守的象征,因而群起诘难。陈寅恪的故友旧朋中,亦有对此不完全赞成者。胡适就认为“对子”是“下流玩意儿”,自称是从来不做的^⑤[16](41—44页);李济未明显表示赞同,只说常作对子,人的理性与思想的逻辑会受限制,暗寓不支持“以对对子取士”之意味[17](137—139页)。

面对舆论哗然,陈寅恪泰然处之。他发表《答记者问》于《清华暑期周刊》7卷6期上。次年,他致刘文典之函,在上海《青鹤》[18]、南京《学衡》[19]、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或转载。其中,《青鹤》所加的“编者按语”曰:

义宁陈寅恪先生,为散原老人第五子,学问淹博,久任清华大学教授,尝以对联为国文试题,一时群起诘难,先生未辨也。顷友人抄得致刘叔雅书。复录以示余。刘为是校国文系主任,曾囑先生拟试题者。此书于命题之旨,颇多发挥,殊有兴趣也。

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陈寅恪认为,国文试题应改变前趣,用一种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这种方法,就是“对对子”,它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

陈寅恪坦率地承认,“此方法去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固甚辽远”,是“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代用品”。但在当时条件下,“尚是诚意不欺,实事求是之一种方法”。其理由如次:一、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可见,陈寅恪“对对子”试题蕴义丰富而深远。在此书中,他还论及“比较研究”需有一定“规范”,即“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鉴于某些洋派人士对本国文化素无信心,凡事牵就西洋的情况,陈寅恪强调本国文字的特性,以及本国文化的特征,由此可见陈寅恪的文化态度:中国文化本位思想[20](37—38页)。另外,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也表达了一些重要学术观点:重视“比较语言学”[21](107页)。陈认为古罗马西塞罗辩论之文,含有对偶。有论者进而认为,西方诗文中“偶体”(Couplet)的诗歌与汉语对子相似[22](343页)。陈寅恪能论希伯莱文之特性,可知其对希伯莱文研究之深。至于论黑格尔等哲学家及哲学思想,可见陈氏“学问淹博”。

陈寅恪此文发表后,学界有更多人赞同。事实上,为庆祝1931年新年的到来,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系主任朱自清就曾新撰清华校门及大礼堂前的联额[23](47页),表明对对子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在学界有广泛的爱好者。陈寅恪的密友吴宓认为,陈氏“《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24](84页)。40年代,在联大作全校性的学术演讲时,吴宓专讲《红楼梦》的回目,评论哪些回目对子好,哪些差,“所着意讲的,是对对子之学”。这表明吴宓赞成陈寅恪的主张[25](314—315页)。俞平伯在散文《秋荔亭随笔——对对子》中追忆年少时对对子之故事,肯定对对子可助作诗之效[26],从侧面赞同了陈寅恪的主张。

“十分崇拜”陈寅恪的人有牟润孙。牟自称:“陈寅老给清华大学出对子后,写的那封给刘文典的信,我都能背下来。”[27](6—7页)他如是回顾此事本末:

大约是在民国二十二三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入学试,国文一科,一道作文题之外,有二条对对子的题目,大受当时人的批评。寅老写一封信给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公开发表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寅老自认题是他出的,强调中国文学中的骈偶性。读文学的人一定要先知道平仄。……此文发表至今(约1970年)已有三十多年,并没看见有什么反对言论。举此一事,即可以明白寅恪先生在语言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超越了。[28](98—99页)

牟氏的回忆有一小误,即时间不是民国22、23年,而是民国21年。从牟文可知,起初批评陈寅恪的意见不少,但后来销声匿迹,证实陈寅恪已预见对对子之事不可废,并且“不失为一个新的试验”[29](301—302页)。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高考语文,仍有对对子之类试题^⑥,的确表明陈氏“如何的超越”。

33年后,陈寅恪撰写了一个“附记”,对当初命题本义作了一番补充:认为作文试题《梦游清华园记》对无论是否到过清华园的考生均适宜,此法与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的唐代“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相同”。这一观点,他早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有强调[30](2页)。他还补充了对对子的标准答案及其解释。陈寅恪此举,表明他对于当初“对对子”风波一事的看重及与刘文典学术见解的相同。

二 联大五年(1938—1943):序《庄子补正》

七七事变后,根据学校的安排,刘文典、陈寅恪南下长沙,执教于长沙临时大学。旋奉迁令。1938年初,文学院、法商学院师生内迁云南蒙自县,由此开始了刘、陈二氏共事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年时光。

1938年4月前后,刘文典、陈寅恪先后到达蒙自。蒙自原为边贸小城,故有法、希、英、德、意等西方列强所设的殖民机构及建筑,如领事馆、海关、洋行、邮局及别墅等,如希腊商人歌胥士(Kolas)曾于城南南湖之畔建有“歌胥士洋行”。后来人去楼空。联大内迁蒙自后,歌胥士洋行成为教授宿舍之一,刘文典、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即寓身此楼。

歌胥士洋行旁即南湖。南湖系洼地积水而成,中有松岛,畔有古亭,又遍植杨柳,不失山水秀色。故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联大教员及联大学生王勉等人常于湖边散步[31](6页),议论国事,切磋学问,乃至吟诗咏词,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人均有咏南湖之诗作。其中,陈寅恪《蒙自南湖》七律曰: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鬢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纷乱的时世,流离的家乡,使陈寅恪产生了浓郁的悲愁,而南湖如画的山水,葳蕤的草木,令陈寅恪回想起升平之世的故都,稍舒郁闷之心^⑦。

陈寅恪诗成,刘文典、吴宓等均称善,吴宓还将全文录于个人日记。刘文典则抄录下来,赠给蒙自士绅马竹斋。刘氏手抄原件至今尚存于蒙自县博物馆[32](93—94页)[33](334—335页)[34](23页)[35](34页)。

9月初,文、法两院奉命迁至昆明。在昆明期间,刘文典讲授中国文学批评、文选,讲《庄子》,还一度准备讲元遗山、吴梅村诗[32](114页)。陈寅恪除授历史课程外,则于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历代诗选(唐)”,二人授课内容虽无直接关系,但也密不可分。

对于《庄子》、《淮南子》等上古秦汉典籍,刘文典素有研究。如《淮南子》一书,早在执教北大时,他就下苦功予以校释,成《淮南鸿烈集解》21卷,附录1卷,由商务印书馆1924年印行,对当时学界影响很大。时为北大哲学系教授的胡适在日记中如是说:

刘叔雅近年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实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工夫。他把各类书中引此书的句子,都抄出来,逐句寻出它的“娘家”。如《太平御览》中引的凡千零二十六条,《文选注》引的凡五百余条,即此两项已费了不少的日力。凡清代校勘此书之诸家,皆广为搜辑。他自己也随时参加一点校语,以校勘为限,不涉及主观的见解。他用的方法极精密,——几乎有机械般的谨严,——故能榨出许多前人不能见到的新发现。……此校不但可正俞校,又可并正《大戴记》。……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工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36](220—222页)

胡适在此之前(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此书可谓是首本系统运用近代西方方法整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著作,在学界影响很大,被誉为在学界进行了一场“革命”。此书至1922年8月即出至第八版[37](53页)。风华正茂、少年得志的胡适之所以如此推重刘文典此书,除了二氏同为皖人、过从甚深外,更有别的理由。刘文典“发愤下此死工夫”,使用精密方法(“几乎有机械般的谨严”),并且立文客观(“不涉及主观的见解”),这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的本意(既包含重新评价、理性批判,又兼有汲取菁华、融化改造)[38](76—85页)有着某些一致之处,故胡适有高度评价之语。

谙悉上古秦汉之书而被陈寅恪目为“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的杨树达[39](230页),亦对刘文典

此书分外看重,在论述时屡加引用[40](1660页、1663页、1690页、1691页)。后来,并撰《淮南子证闻》一书[41]。

对于《庄子》,刘文典积数十年之功,更有独到的研究。早在清华内迁前,他就指导过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张恒寿研究《庄子》。及至联大期间,他亦在中文系讲授《庄子》[32](112页)。他于精研后完成《庄子补正》一书。他尝言自己为此书之标准是:“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42](1018页)刘氏自述表明,《庄子补正》成书与纠改前人、时人无据臆断的不良学风有关,这从侧面说明刘文典谨严的治学态度。对于自己的《庄子》研究,刘文典十分自负。

《庄子补正》书成,商务印书馆将刊行。刊前,刘文典持本请陈寅恪审阅,并请作序。作为清华以来十余年的同事,陈寅恪对刘文典的《庄子》研究早已心仪,故欣然接受。1939年11月,陈寅恪序《庄子补正》,文曰: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无。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己卯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书于昆明靛花巷北京大学研究所宿舍[43](229页)

序文中,陈寅恪首先以“天下之至慎”来褒扬《庄子补正》“补”、“正”标准之严格:“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则不之正。”由于“谨严若是”,或有矫枉过正之味。

其次,陈寅恪解释了刘文典“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实在是迫不得已。这种“非得已”正是刘文典学风“大异”于时世的原因。陈寅恪考溯学风,以明清之际的金圣叹为例。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自恃其才,肆言无忌,尝谓天下才子之书有六:一庄、二骚、三马史、四杜律、五水浒、六西厢记,因此为各书作评注。以金圣叹评注的《水浒传》为例,陈寅恪批评了金圣叹随意补改原著的浮华学风。而这种“明清放浪之才人”“谈商周邃古之朴学”的不良学风,对后世影响恶劣,在当时治“先秦子史之学”中表现最为突出。陈寅恪对此极为痛心疾首,并愤言“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陈寅恪作此愤言,决非无故呻吟,而是有的放矢。

自从1919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经过蔡元培等人的不断呐喊,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史辨派”之崛起即与此直接相关。但是,随着“整理国故”大潮的纵深发展,其性质也有了变化,从胡适既包含理性批判又吸收改造的本意,偏向全盘反对传统的一端。就“先秦子史之学”的研究而言,此学由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直接推动等原因而大显于世,众多学界名流纷纷挥笔泼墨,如陈寅恪序文所言“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在此热闹若市的显学浪潮面前,陈寅恪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31年,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即冷静地指出: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之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此。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遍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44](247—248页)

陈寅恪所言,显然为胡适所注意,他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观点。1936年6月,在致罗尔纲的函中,胡适说:凡治

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45](60页)。这表明胡适、陈寅恪对整理国故的某些看法较为接近。

陈寅恪所针贬的治墨学、著中国哲学史的学风,不正是他在刘文典《庄子补正》序中所云“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之学风吗?与金圣叹“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而其“所谓古书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之学风并无区别。由此,陈寅恪痛斥这种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谈商周邃古之朴学”的不良学风。在此,笔者对陈寅恪1935年言“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及本序中“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略作剖析。从事实来看,陈寅恪对三代两汉之书熟稔于心。俞大维回忆说: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21](48页)。陈寅恪与董作宾学术讨论的《与董彦堂论年历谱书》[43](313页)、教示蒋天枢读《周礼》[21](156页)等,均可表明此点。事实所揭示的均与陈寅恪自言不同,其原因固然在于上古史料有限、众说纷纭难以论定之故^⑧,更在于陈寅恪对当时谈“先秦史之学”学者的不良学风的愤恨所致。

其三,在序文中,陈寅恪高度评价了《庄子补正》一书出版的意义。认为此书之刊布,不仅在于“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更在于匡正当世之学风,示范学界以准则也。能获陈寅恪如此首肯,大概只有陈垣、杨树达等数人而已。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陷香港,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他曾在讲授时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46][47](260页)刘文典对陈寅恪之推重,还有多种记载可以证明。其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峻(原西南联大学生)言:刘文典曾谓,如陈先生月薪500元,则我只能拿50元。刘先生平时目无余子,亦对寅老服膺如此[48](11页)。其二,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49](3页第21条)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互相推重,是二氏友谊的坚实基础之一。

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联大教授困于生计,不少人去教中学、做家教或兼它职。如1944年朱自清就曾在昆明一间私立中学教高三国文[27](263—264页)。支领联大、史语所双薪的陈寅恪亦叹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1940年2月);“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春,因有学生在云南磨黑办学,刘文典应请前往磨黑,旋任磨黑中学校长,脱离了联大[3](118页)。由此故,刘文典被联大掌权的小人借机解聘。

闻知此事,时在广西桂林的陈寅恪十分担忧。陈寅恪致函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文史系主任姜亮夫,推荐刘文典前往执教[50](97页)。半年后,刘文典返昆明。从1944年起,刘文典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此后,他执教于此,直至1958年去世。解放后,刘文典专门研究杜甫,订正了杜甫年谱。

刘文典执教云南大学时,陈寅恪寓身于昆明靛花巷宿舍楼上,离云南大学校门不远[10](57页),刘、陈二氏亦有相当的学术交流。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先北上北平,复蛰居岭表,与刘文典的论学谈艺亦大减。其中的未发之覆,只有待来日新材料的发现了。

三 治学方法等领域的同异

就治学领域而言,刘文典“早治《说文》及《文选》学,博览渊综,尤有辞章、训诂两家之长。于清代学者特服膺高邮王怀祖、伯申父子,由是雅好校勘古籍”[42](1018页)。怀祖、伯申乃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字,均以精音韵、训诂、文字之学著名,世所称“高邮王氏父子”也。由此,刘文典有《淮南鸿烈》、《庄子》、《西域记》等书之整理,尤其是前者,“久为国内外学者所共推挹”[50](97页)。对于上古、秦汉及中古之史学,刘文典则基本上无重要成果。

陈寅恪早年重视“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研究[43](234页),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佛教文学、敦煌文书研究等)更是其终身关注及研究的重点。对于上古、秦汉文史之学,陈寅恪虽然相当谙悉与了解,并非“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但是事实上他在这一领域并无重大建树。较大差异固然存在,但在治学领域方面,刘文典、陈寅恪并非毫无相同或接近之处。刘文典对上古、中古之史亦曾有过研究,发表过《最容易读错的几个成语》等论文[4](91—93页),总结上古、中古历史上人名、地名等专名的读音。

在唐诗研究上,刘文典、陈寅恪均曾著功。尤其是李商隐、温庭筠诗,刘、陈二氏更是情有独钟。陈寅恪擅长旧体诗,融合李商隐、韩偓、白居易、吴梅村及宋代诗派而加以创新,以至士林有“陈散原(寅恪父三立之号)后人,无一不佳,却无一学乃翁之诗”之谓[51](320页第4117条)。在陈寅恪诗中,常用李商隐诗韵,如1942年《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即用李商隐《万里风波》无题韵[34](31页)。在西南联大期间,陈寅恪曾在中文系讲授《历代诗选》中“唐诗”;后来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又以李商隐诗来“考试”学生[52](184页)。刘文典则对温、李诗素有兴趣。执教联大时,他就在《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课程中,讲授“温李诗”[32](112页)。刘文典讲授时,刘、陈二氏的老友吴宓多次前往旁听^⑨。有趣的是,不仅陈寅恪师李商隐诗法,吴宓亦然。对此,刘文典予以指出。据《吴宓日记》记载:1941年12月9日晚,“刘文典来,读宓《诗稿》。赞宓《送寅恪》五古诗,而最取宓《无题》七律。谓‘置之李义山诗中,可以乱真’”[50](210页)。

《红楼梦》及其研究,也是刘文典、陈寅恪的共同兴趣。早在1919年留学哈佛大学之时,陈寅恪即作《〈红楼梦新谈〉题辞》诗,由此开始了与吴宓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53](20页)。此后,在他的论著中仍可见到对《红楼梦》的文学评论[54](53页、60页、61页)。在吴宓等人的影响下,刘文典对“红学”也有一定研究。1940年5月,“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在昆明成立不久,吴宓即介绍石社总干事(相当于社长)顾良见刘文典,邀之入社;并且,“宓持《红楼梦研究集》借典读”。1942年春,联大在校园中举办各种系列讲座。从3月开始,国文学会举办“中国文学十二讲”,隔两周讲演一次,刘文典主讲第二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吴宓两次均前往旁听[55](167—168页)[50](265页、272页、406页)。

对于旧体诗文,刘文典、陈寅恪均有较高造诣。胡适认为,刘文典“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36](222页)。刘文典本人亦认为“诗人必具真情”。其论诗之道,大为吴宓所钦服。因此,吴宓不仅以其诗作示刘文典,而且多次请刘文典修改诗作[50](215页、258页)[55](253—255页)。无独有偶,请刘文典改诗的吴宓,请陈寅恪改诗(含对子等)更多,此事于《吴宓日记》不胜枚举,故吴宓道:“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24](84页)

治学领域上大异小同的刘文典、陈寅恪二氏,在治学方法上却大同小异。

有着两次留日经历的刘文典,采纳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典籍的研究方法,同时汲取了传统治学方式,这与他曾一度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等国学家有关,故刘文典治学方法是合中西之法而一之。在北平清华时期,刘文典讲授《校勘学(附实习)》课程,其指导思想及教学目标是:“讲授校读古籍之方法,并实施演习试验。取古书数种,用清代校勘家及日本、西洋学者之方法,正其文字之讹错,补苴其章句之阙逸。俾学生实际练习,养成其董理古书之能力”[8](306页)。刘文典本人遵此方法,先后整理《淮南子》、《庄子》、《文选》等典籍。因此,可以说《庄子补正》等书实乃“校勘训诂专著”[42](1023页)。刘文典还曾有意整理《西域记》,作了大量的批注、校注[55](174—180页)。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刘文典同出一辙。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35年条曰:陈寅恪自执教清华,展开对中译本佛经之研究,其治理方法即先从“校勘工作”开始,故陈氏之工作,在于比较其版本之异同,订正其传写之舛讹,批纠其旧疏之违失,因而陈氏所读之书,眉批、旁注,朱墨纷呈即为一例。所以,蒋天枢指出:“先生治学方法,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21](85—89页)可以看出,在治学方法上,刘、陈二氏均中西之法合炉共治,是基本一致的。

在治学态度上,陈寅恪之严谨人熟能详,此不论矣,而刘文典亦素以严谨闻名。如前述胡适言,刘文典之作“几乎有机械般的谨严”,而陈寅恪在《庄子补正》序中甚至称刘文典谨严若是,矫枉过正,以致“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均表明刘、陈二氏在治学态度上的极其谨严,迥异于当时“才人式”的放浪治学方式。

在课堂授课上,刘文典、陈寅恪亦有一致之处。刘文典认为,高校教员须对某一方面有专门研究。因而在课堂上,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三徐札记·谈〈文选〉札记》记录了刘文典在“文选”课上的讲授内容[32](118页),多系他对“文选”的个人研究成果。陈寅恪亦然,他在授课时,往往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嘱咐学生不宜把听讲的内容率先发表。如1937年末、1938年初在长沙

临时大学时,陈氏对“南方民族巴、蜀、蛮、僚、溪、俚、楚、越,一个一个的分别讲释过”[32](118页)。这一研究成果,陈寅恪1944年发表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①。这表明二氏均以研究心得授传学生。

言及民族气节,刘文典、陈寅恪二氏更是一致。1939年,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曰:

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沈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42]

刘文典所言,与1940年陈寅恪自喜“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何其一致。至于刘文典青年有报国之志而未展酬,并于自序中抒之,则非陈寅恪所愿也。

可以看到,从水木清华到西南天地,刘文典、陈寅恪二氏历家国之难(刘文典丧嗣子^②,陈寅恪失尊人)、流离之苦,而民族气节不丧,严谨治学不改,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与惺惺相惜,有着牢固的基础:二人共同的教书育人(同校同系前后十三年),算是同仁;共同的斗争经历(驱吴运动等),可谓同志;互有交叉的治学领域,更是同事;一致的治学方法(一中西治学之法),堪称同道。因此,二氏在学坛上留下论道学艺之佳话,传为士林美谈,自不足奇。

注释:

- ①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载王元化主编《学林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从20年代起,陈寅恪就多次为吴宓等人撰改对联,亦可说明此点(《见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7—28页)。
- ②此联或曰陈寅恪、郭沫若各写半联;或曰郭沫若作,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7页。
- ③劳干《忆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17卷3期,1970年。但邓云乡说,“祖冲之”是陈寅恪的自拟答案(《也谈“孙行者”》,《文汇报》1991年11月30日)。吴小如则说,据卞慧僧(卞慧新)言,“王引之”才是陈寅恪的自拟答案(《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联语》,《团结报》1991年11月6日)。因为有陈寅恪1965年写的“附记”,表明自拟答案为“胡适之”,故邓、吴说均不正确。邓文又曰:“‘孙行者’对‘胡适之’,也是流水对。在意思上不当人名讲,就是‘孙子行走着’,下句对‘到哪里去呢?’这里‘胡’是文言疑问词,‘适之’是去哪里的意思。当年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有些反对白话的老先生就说:‘胡适为什么不改名叫往哪里去呢?’周先生当年以‘胡适之’对‘孙行者’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当作笑话,这一巧对流传很广”,可以参阅。
- ④周一良《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90年代,王翼奇对以“文中子”,可称巧对。王系20年代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参见叶九如《“文中子”可对“墨西哥”》,《读书》1997年1期,第131页)。
- ⑤事实上,胡适一生也撰写了不少对联,翻看《胡适日记》随处可见。
- ⑥1987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第六题以“梨花院落溶溶月”为上句,要求在以下四句中选出最恰当的对偶句:(A)柳絮池塘淡淡风;(B)榆荚临窗片片雪;(C)带水芙蓉点点雨;(D)丁香初绽悠悠云。答案为(A)。这两句诗出自宋晏殊《寓意》。1992年,全国高考语文则考过南宋刘过《沁园春》,第六题出了上句“疏影横斜水清浅”,要求选下句:(A)暗香浮动月正明;(B)暗香浮动合断魂;(C)暗香浮动共金樽;(D)暗香浮动月黄昏。答案为(D),源出七律《山园小梅》第二联。这些试题都测试了考生的对仗知识。2002年,颉西(王勉,1938年毕业于联大社会学系)说:“陈先生此文所含的深意即对于当前语文教学也大有启发。”见《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 ⑦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页。对于《蒙自南湖》诗意的理解,可参阅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5、350页)。
- ⑧金应熙《陈寅恪传》,第1365页。近来又有人由此引申为系陈寅恪的“史学标准与上古范围内史料太少这一固有局限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见殷祝胜《史学标准与学科局限——陈寅恪放弃早年治学领域的根本原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4期,45页。
- ⑨如1942年3月3日、10日、24日,吴宓均前往联大“南区20乙教室(7)听(刘文)典讲李义山诗”,见《吴宓日记》第八册第258、262、269页等。
- ⑩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卷首”。陈寅恪这一论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11本1分册,1944年,此据《金明馆丛稿初编》,第69—106页。

①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所言的“亡儿成章”,原系刘文典胞侄,1937年5月22日过继为嗣子,但很快夭折(《吴宓日记》六册,第133页)。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以致刘文典治《庄子》而有庄子思想,认为“世事之治乱犹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安徽大学出版社与云南大学出版社新近联合出版了《刘文典全集》,煌煌4册共240万言,可供参阅(见《文汇报》2001年7月7日第12版的报道)。

参考文献:

- [1] 罗家伦. 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J].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北京), 第12期. 1928-11-23.
- [2] 罗校长与上海记者谈话(1929-04-16)[J].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 第61期. 1929-04-26.
- [3] 姜健, 吴为公. 朱自清年谱[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 [4] 刘文典. 最容易读错的几个成语[J]. 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 3, (1). 1932-05-01.
- [5] 陈寅恪.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J]. 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 1, (3). 1931-04-30.
- [6] 驱吴运动爆发[J]. 清华周刊副刊, 35, (12). 1931-06-06.
- [7] 四十八教授态度坚决之声明(1931-05-28)[A]. 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二卷上册[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 [8]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程一览(民国25年至26年度)[A].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二卷上册[M].
- [9] 陈寅恪.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及“附记”[A].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0] 翁同文. 追忆陈寅恪师[A]. 王永兴. 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周祖谟. 往事自述[J]. 文献, 1988, (4).
- [12] 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J]. 燕都, 1990, (2).
- [13] 陈智超. 张政烺先生访问记[J].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2, (4).
- [14] 周一良. 毕竟是书生[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15] 劳干. 忆陈寅恪先生[J]. 传记文学, 1970, 17, (3).
- [16] 姚高淑芳. 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J]. 传记文学, 1970, 17, (5).
- [17] 李济.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A]. 李光谟. 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 [18] 青鹤, 1933-02-16.
- [19] 学衡, 1993, (79).
- [20] 汪荣祖. 陈寅恪评传[M]. 广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 [21]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22] 刘以焯. 国学大师陈寅恪[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6.
- [23] 浦江清.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M]. 重庆: 三联书店, 1987.
- [24] 吴宓. 空轩诗话[M]. 第146页. 转引自: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 [25] 唐振常.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A]. 川上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26] 俞平伯. 秋荔亭随笔——对对子[N]. 俞平伯散文杂论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27] 牟润孙. 谈谈我的治学经历[J]. 文史知识, 1988, (2).
- [28] 牟润孙. 敬悼陈寅恪先生[A]. 海遗杂著[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0.
- [29] 唐振常.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A]. 川上集.
- [30]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1] 魏西(王勉). 清华园感旧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2]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 [33] 吴宓日记: 第六册[M]. 吴学昭整理注释.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34] 陈寅恪诗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 [3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36] 胡适. 胡适的日记[M]. 香港: 中华书局, 1985.
- [37] 耿云志. 胡适年谱[M]. 香港: 中华书局, 1986.

- [38] 胡明. 胡适“整理国故”的现代评价[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5, (2).
- [39] 陈寅恪.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A]. 金明馆丛稿二编[M].
- [40] 杨树达. 古书之句读[J]. 清华学报, 1928, 5, (1).
- [41] 杨树达. 淮南子证闻: 七卷[M]. 北京: 中国科学院出版社, 1953.
- [42] 刘文典. 庄子补正: 下册[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43]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 [44]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 金明馆丛稿二编[M].
- [45] 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46] 傅乐成. 我怎样学起历史来[N]. 中国时报, 1968-05-07.
- [47] 时代的追忆论文集[M]. 台北: 时报出版公司, 1984.
- [48] 周一良致李玉梅书(1988-07-26)[A]. 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M]. 香港: 三联书店, 1997.
- [49] 转引自: 盛巽昌、朱守芬. 学林散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50] 吴宓日记: 第八册[M]. 吴学昭整理注释.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51] 郑逸梅. 艺林散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2] 陆健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53] 吴宓与陈寅恪[A]. 第4页. 吴宓日记: 第二册.
- [54] 陈寅恪. 论再生缘[A]. 寒柳堂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55] 吴宓日记: 第七册[M].

On Academic Intercourse Between Liu Wendian and Chen Yinke

WANG Chuan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Liu Wendian and Chen Yinke is not to be neglected in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The period between 1927—1943 sees in the national calamity and personal wandering their unceasing intercourse, unchanging academic seriousness and commendable national integrity on a firm basis.

Key words: Liu Wendian; Chen Yinke; intercourse;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责任编辑: 凌兴珍]